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外交思想 演变的原因及现实启示

孙 锋

(南通大学杏林学院,江苏 南通 216000)

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外交思想经历了一系列转变,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发展到“一大片”的外交政策,最终发展为“三个世界”理论。通过对毛泽东外交思想发展脉络原因的剖析,对于发展和完善中国的外交事业,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外交思想;演变;启示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50(2012)01-0014-05

毛泽东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者,毛泽东外交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毛泽东外交思想,对于推动和谐世界建设,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提出“一边倒”外交思想的原因

(一)“一边倒”外交思想的提出

毛泽东早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明确提出了“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1]“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1]

1949年9月下旬,《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的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这是毛泽东“一边倒”外交思想内容的具体化和法律化。“一边倒”成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点。“一边倒”政策侧重点是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绝

不意味着中国的外交仅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而不与资本主义阵营有任何交往,毛泽东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1]

(二)“一边倒”外交思想提出的原因

1. 意识形态的共性

由于共同的意识形态纽带,同时由于苏联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作用以及两大阵营之间的紧张对峙,毛泽东认为,“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2]中国革命既然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那么中国的外交政策,也理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保持一致。

2. 两大阵营的对立

二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中共已经视美国为新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担心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新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决定了新中国联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必要性,因此,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联苏制美”成为中共优先选择的外交战略,不可能走第三条道路。此外美国长期以来站在中共的对立面,执行“扶蒋反共”的政策,并对新中国采取“遏制与孤立政策”,而苏联长期对中国

收稿日期:2011-12-18

作者简介:孙 锋,男,江苏南通人,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思想政治教育。

革命的帮助和指导,使中共在情感方面也自然偏向社会主义阵营这边。

3. 经济利益的考虑

新中国成立初期,多年的战争已经使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新中国成立后也急需进行经济建设。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苏联就承诺将会给新中国提供经济援助和支持,如果中国保持一种所谓的中立立场,则苏联也会采取观望态度。^[3]从现实层面讲,苏联比美国更愿意为中国提供援助。中苏同盟期间,苏联不仅提供了大量援华物资,同时派遣了大批技术专家和顾问,帮助中国开展经济建设,为新中国经济的迅速恢复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智力支持,同时也奠定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基础。

4. 地缘政治的因素

中苏两国是邻国,双方接壤的边境线较长,争取盟国苏联的支持,有助于自身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大后方,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一个可靠的屏障,也有利于抑制美国的军事威胁,同时苏联借助中国也有助于抑制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

二、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的原因

(一) “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

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思想。“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4]接着毛泽东简要地说明了划分的根据。“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你看这个解释好不好?”卡翁达表示赞同,毛泽东接着又解释道:“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4]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对“三个世界”的思想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5]

(二) “三个世界”理论提出的原因

随着苏联的对外政策演变为霸权主义,社会

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逐渐向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过渡,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世界面临着原有的国际政治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由两极向多极化发展的历史形势。因此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正是基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世界形势,对新的世界格局所做出的判断。

1. 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矛盾

二战结束后,苏联实力得到迅速提升,推出了美苏合作主导世界的方针,苏联的国家政策逐渐向霸权主义、沙文主义的方向演变。他们不断干涉他国的内政,要求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都要服从苏联的领导并服务于苏联的全球性战略。对于坚持独立自主,反对苏联控制的国家 and 政党,则不断施加压力,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毛泽东对于苏联外交政策的演变有着较强的政治敏感度和警觉度,毛泽东坚决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苏联为迫使中国屈服而施加的种种压力,毛泽东都进行了积极的抵制,也使中苏两党的分歧逐步暴露,爆发中苏两党之间的大论战,开展了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全面批判。由于受到当时“左”倾错误思潮的影响,这些批判有其不足之处,如对修正主义的概念缺乏清晰明确的解释,通过这些斗争,毛泽东也逐步认识到苏联已蜕变为霸权主义、社会帝国主义。

2. 资本主义阵营的内部矛盾

二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但是由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削弱了其自身实力,同时也削弱了对盟国的控制力。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力量对比发生了新变化。从占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总值比重看,以1948年同1970年比较,美国由54.6%下降为37.8%,法国由4.6%上升为6.5%,联邦德国由3.6%上升为10.1%,日本由1.2%上升为9.5%。同期,美国出口贸易在资本主义世界所占比重从32.0%下降为15.2%,法国由3.7%上升到6.4%,联邦德国由1.4%上升为12.2%,日本由0.5%上升为6.9%。^[6]美国经济地位的下降,西欧和日本经济地位的上升,出现了美国、西欧和日本三足鼎立的局面。而阵营内部其他国家实力的恢复和增

长,同时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这些国家越来越不甘心受美国制约,离心倾向越来越强,甚至出现分庭抗礼现象,致使阵营内部矛盾更加凸显。

3. 亚非拉国家的崛起

二战后,大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经过各种形式的斗争,逐渐摆脱了各自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走上了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许多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不愿介入美苏之间的斗争,希望在两极化的国际格局中保持和平与中立,采取了不结盟的外交政策。随着不结盟运动的发展,其队伍也不断扩大,斗争矛头由最初指向新老殖民主义,到70年代转向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斗争领域也由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并在60年代成立了自己的经济组织“七十七国集团”。这些国家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国际舞台,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深刻影响着世界格局。

三、毛泽东谋求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原因

(一) 毛泽东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原因

1. 外部因素

第一,国际形势的变化。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如何对付苏联,美国决策者通过美苏关系来确定中美之间的对立与缓和。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由于深受其侵越战争的拖累,内外交困,不得不有所收缩;苏联则趁机加紧向外扩张,对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在美苏争霸的局面上,呈现出苏攻美守的局面,中美之间出现了达成和解进而改善关系的可能,中美联合抗苏也成为可能。尽管苏联咄咄逼人,但在中美苏三角战略态势的转换中,中国和美国处于主动,其中美国的主动性尤为明显,而苏联基本上处于被动应付局面。

第二,中苏关系的破裂。建国初期,苏联给了中国大量的支持与援助,但同时苏联对中国交往中的大国沙文主义也逐步发展。1958年,出现了“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随后不久,苏联召回了在华的苏联专家,终止了苏联援建的项目,撕毁了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也爆发了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中苏分歧逐步公开。意识形态的冲突逐步扩散

到各个领域,最终演变为珍宝岛的流血冲突,珍宝岛事件标志着中苏关系彻底破裂。由于中苏两国处于严重的尖锐对立状态,中国外部的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联美抗苏”成为中国的战略抉择,应对苏联的军事威胁和苏联的全球扩张成为中美实现和解以及关系正常化的共同战略基础。

2. 内部因素

第一,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建国初期,我国国防的重点是防范美国的军事入侵,防御重点是在东南沿海地区,但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大量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增兵,在北方对中国构成了威胁。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急剧恶化,中国同时面临着来自美苏的军事压力。1968年苏联侵入捷克斯洛伐克,提出“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的口号,显示出苏联意图通过武力方式解决意识形态分歧的态势。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由来已久,苏联实施的一系列动作,使中国感受到苏联武力入侵的压力。面对苏联方面的军事压力,中国的安全战略出现了重大的调整。毛泽东在考虑部署华北大城市的防御时,特别指出“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一切都要准备好”^[7]。这次战略防御的调整,中国国防战略从单方面侧重防御美国,逐步转变为美苏并重。随着珍宝岛事件的爆发和美越和谈的实现,则又一次促成中国战略防御重心的转移,从而转变为以防御苏联为主。随着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中美关系也出现了新的曙光。

第二,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重建。20世纪50年代后期,受到国内“左”倾思潮和国际共运中反对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外交路线也受到“左”倾错误思潮的影响。随着中苏同盟关系的逐步破裂以及中苏之间的论战,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左”倾思潮,在涉及国际形势判断、国际共运、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战争与革命等理论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的决策也越来越呈现出简单化、片面化和绝对化的倾向。“文革”的发生,外交部门也受到了严重冲击,中国的外交工作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以至于出现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类的恶性外交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的发生是“文革”期间中国外交工作混乱到极点的标志,同时也促成了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周恩来在请示毛泽东

后,果断采取措施平息了这场外交事件,周恩来重新掌管中国的外交工作,并形成了毛泽东—周恩来外交决策的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极“左”的外交路线,对外交工作重新走上正轨起到了一定作用,从而也为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毛泽东谋求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原因

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表示,“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应该忘记,因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记在我们脑子里干什么呢?”^[4]毛泽东主张中日之间“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4]。

1. 美国因素

二战后,由于美国的霸权地位及其对日政策,日本政府实施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对华政策上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影响了两国之间恢复邦交的可能。在苏攻美守的大局面下,尼克松政府表达了希望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愿,中国方面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并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外交举措,希望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创造条件。随着中美关系出现缓和的迹象,当时的日本政府仍然奉行追随美国的政策,外交领域政策还尚未有所跟进,并未采取积极措施改善对华关系。当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出来以后,才使日本政府有所转变。中国政府以此为契机,因势利导,日本民间要求邦交正常化的呼声占据了主流,日本政府也积极调整外交政策,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创造条件。

2. 民间外交

“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孤立美国,间接地影响日本人民,给日本政府以压力,迫使日本改变对中国的关系,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8]。日本与中国的首次民间交往的实现是1952年由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要喜助等日本人士提出的,并与中国方面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9],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中国首倡的“以民促官”和“官民并举”的基本政策,较好地推动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依靠前期的民间交往和经济贸易的往来,为两国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现实启示

1. 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独立自主是指国家的主权是独立的,不允许任何外来的干涉与侵犯,每个国家都有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地、自主地处理本国对内对外的一切事物,独立自主思想成为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根本原则。在新时期,我国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具体表现为:第一,坚持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同大国结盟可能妨碍和影响我们广交朋友,因此我国不谋求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结盟。这一原则的提出得到了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认同,同时为独立自主外交的思想又增添了新内容。第二,形成全方位的外交格局。我国应发展同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应该摒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对话交流,保持和增强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协作。我国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的精神,坚持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和开展全方位的外交,有助于增强我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回旋余地,同时也有利于保持世界力量的均衡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还有助于树立中国国际新形象,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推动国际政治民主化。

2.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毛泽东所主张的和平共处的原则,成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毛泽东明确指出“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4]由于当今世界各国在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面对如此高度多样化和多元化的世界,建立和谐包容的世界秩序,就必须有适当的国际关系准则来正确指导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最佳诠释,反映了最根本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的准则。在新时期我国继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具体表现为:第一,反对强权政治,建设和谐世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全球国际政治伦理与国际秩序的指导原则,只有不同国家间和谐共处,实现国际

关系民主化,才是建设和谐世界、促进人类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关键和前提。我国应该继续反对各种形式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反对诉诸武力解决国际纠纷和争端,坚持和平、公正和民主的多边主义策略。第二,坚持“求同存异”的理念。由于国家之间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发展阶段,大小强弱都不一样,因此我们应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尊重多样性的前提下,寻找各自的共同利益基础,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与对话,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和冲突,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3. 坚持与时俱进的外交政策

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是高度灵活的,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毛泽东决不拘泥于固定的模式和意识形态标准来规划外交活动,从而为新中国的外交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在新时期我国继续坚持与时俱进的外交政策,具体表现为:第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宏观上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的进程。微观上根据国家间关系的微妙变化,适时调整我国的外交政策,增强我国外交政策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第二,

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策略。在固守一定的外交原则和保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同时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增强外交政策的灵活性,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争取外交政策上的主动性。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3]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4]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 [5]人民日报[N].1974-04-11.
- [6]何春超.国际关系史(1945~1980)[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
- [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8]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
- [9]杨正光.当代中日关系四十年(1949~1989)[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王彩红 陈 强

On the Diplomatic Thoughts Evolution and Reality Enlightenment of Mao Zedong After Founding the Nation

SUN Feng

Abstract: After founding of the nation, Mao Zedong's diplomatic thoughts has experienced a series of transformations, the 50's "asymmetrical" period formed the "asymmetrical" foreign policy, the 60's "anti - two tyrants" period formed "a big piec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70's "the big triangle" period formed "three worlds" strategic concept, through evolution of the thinking of Mao Zedong's diplomatic analysi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China's independent peaceful foreign policy, creating a new situation in diplomacy, promoting the building of a lasting pea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of a harmonious world, has the very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Mao Zedong; diplomatic thoughts; evolution; enlightenment